

外国文化研究丛书

(美) E·T·霍尔著

韩海深译



超越文化



外国文化研究丛书

超越文化

(美) E·T·霍尔著 韩海深译

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

Anchor Press/Doubleday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6

据美国安克出版社/道勃德出版公司1976年版译出

(美) E·T·霍尔著 韩海深译

超越文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0.25 插页4 字数130千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

ISBN 7-5366-1148-X/G·426

定价: 3.90元

中译本序

霍尔(E·T·Hall)的代表作中,经我们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已有两本(除本书外,《无声的语言》业经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极力推崇他的思想和著作,是立足于以下几点认识:

1. 世界各国及台湾学者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赋予他崇高的地位,中国大陆的学者对他的了解太少、介绍不足。

2. 他能给中国的文化热提供崭新的视角,促进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理论界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使中国的文化研究打上了强烈的政治烙印,带上了强烈的哲学、伦理的理性色彩;中国的文化研究缺乏深层的文化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角度的剖析,需要从这几个角度去填补空缺;它偏重对显意识文化的关注,对无意识文化的关注几近于零;它偏重纯理论、书斋型的研究,对实际生活的关怀不够,因而令一般人有曲高和寡之叹。

3. 中国的文化研究以哲学界为主力军,缺乏

一支多学科的队伍；理应成为文化研究主力军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界没有标新立异的领头人物和创新论著。

4. 中国的大门敞开之后，跨文化交流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迟迟未动，已经给国际交往、国内建设造成损失。

在上述各方面，霍尔的思想都将给我们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他在文化研究中构筑了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多视角的宏大体系：

1. 他借用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对文化进行系统分析，提出文化即是通讯的观点，把文化当做一个巨大的通讯系统，按人类活动的领域把文化分成十大子系统（交往、组合、生存、性别、空间、时间、学习、游戏、防卫、开发）。

2. 他按意识程度的高低把文化分成三个层次：技术文化、显形文化和隐形文化。技术文化清晰度最高、情感性最低、意识程度最高，隐形文化清晰度最低、情感性最高、意识程度最低。

3. 他借用语言学理论把文化分解为三个层次：元素（相当于音位）、集合（相当于词）和模式（相当于句子）。他对模式的界说和分析精彩纷呈。

4. 他对空间语言、身势语言和时间语言的分析新颖独特、富有创见，对国际了解、文化交

流极为适用。

5. 他提出一连串二分术语：一元时间和多元时间、高环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环境文化，给比较文化提供了许多精当的参照系。

6. 他追溯了文化的生物学基础和神经生理学基础，给非理性文化和无意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7. 他分析了无意识文化的结构框架，提出了情景框架(最小的、能独立存在的文化单位)和行动链的结构分析法。

8. 他深入分析了非理性文化的各种表现，提出五种类别：情景性非理性、环境性非理性、神经过敏性非理性、官僚主义的和制度性的非理性、文化性非理性。

9. 他提出的无意识文化不同于过去一切思想大师的无意识理论。弗洛伊德研究的是个人无意识(本我、自我、超我)，荣格研究的是集体无意识(先天遗传的、人类共同的无意识)。霍尔的文化无意识是处于知觉之外、尚待提升到显意识层次的东西，包括时间语言、空间语言、人体节律和同步运动(syncing)等范畴。

10. 他提出延伸及延伸迁移的理论。他认为文化是人外化的一种屏障、筛子和桎梏。之所以说文化是屏障，是因为它对人具有保护作用。之所

以称之为筛子，是因为它有信息筛选功能，能避免“信息超荷”。至于说它犹如桎梏，是因为延伸迁移形成了对人的种种限制。延伸迁移 (extension transfer) 的理论包括以下要点：

1) 延伸系统形成之初富有弹性、易于改变，后来逐渐成为僵化的、难以改变的东西。

2) 延伸系统取代被延伸的过程，符号代替了所指。偶像崇拜即为一例。偶像是人的外化，可是它取代人，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

3) 人的延伸分为若干世代，如体态语言是第一代的延伸，口语是第二代的延伸，书面语是第三代延伸。后一代的延伸往往掩盖前一代的延伸，如口语掩盖体态语言，书面语掩盖口语，使被掩盖的延伸模糊不清，成为仿佛没有结构的东西。

4) 延伸迁移的功能障碍。延伸系统被用于不恰当的情况，延伸系统就会出现功能障碍。如拉丁语法硬套到汉语头上，硬科学的范式用于软科学等等。

5) 延伸迁移是人与自我和传统日益疏离的因素之一。

上述各点用霍尔的话说，叫做延伸迁移综合症，这是我们在摆脱文化钳制、超越文化局限中必须翻越的障碍之一。

霍尔在他的著述中，反复对西方思维模式和时间语言提出批评。一方面，他明确主张东西方

的思维模式、一元时间和多元时间各有利弊，世上绝无排它性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同时他又告诫世人对自己文化模式的局限性要有所认识。比如，他认为，北欧传统中分裂切割、条块分割、线性排列、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一元时间系统，就使许多未竟之事功败垂成；分析切割、线性排列、逻辑、理性、语词的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就与大脑的整合功能、“全息功能”不协调，如果只用这种思维模式，大脑的潜力尚未发挥其万一，那就是一个大的悲剧。

霍尔之所以能构筑如此宏大的理论体系，提出如此深刻的忠告建议，这与他的学术履历和职业生涯密不可分。他是理论实践并重、书斋田野兼顾、学者顾问合一的多学科的横向人才和怪杰。几十年来，他从事教学、科研、心理分析和技术咨询，成为闻名遐迩的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心理分析专家、政府和企业界的高级顾问，他的足迹遍布世界，他对原始民族和现代民族、东西文化都有实地的考察和深刻的体验。他辛勤笔耕，对文化分析的普及和跨文化的交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交流与合作，做了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译者

1988年10月

导 论

当今世界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最一目了然的危机，是人口/环境危机。第二个危机，更微妙然而同样致命的危机，是人与其延伸物、制度、思想的关系中存在的危机，以及地球上居住的许多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危机。

如果说，现在这两个问题并非都已得到解决，那么将来这两个问题也并非都可以得到解决的。尽管我们相信技术，尽管我们依赖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然而人类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是不可能用技术手段去解决的。而且，只有人类超越了自己的技术、哲学和文化加之于自己的精神局限，那些可以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手段，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使上述各种问题尤为复杂不堪的，是当今的政治现实。

政治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始于家庭生活之中；在地区、国家和国际的层次上较大的制度中，政治逐步变得愈益清晰可见，正如权力

显得愈益明显一样。我们不应受政治或政治制度表象的愚弄。我们研讨的是权力和权力的使用。毋庸置疑，生活决不应该仅仅是装模作样的或明火执仗的权力。至少，人们希望，权力动机总有一天能与更加合理、更加富有人情味的方式相结合去处理问题。举例说吧，在俄国人与西方的关系之中，除了权力之外，文化仍然扮演着一个地位突出、显而易见的角色。古往今来，文化不仅是欧洲和俄国之间的问题，而且是欧洲各国关系之间的问题。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也好、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文化也好，都有其自身的民族认同、语言、非言语交际系统、物质文化、历史和办事的方式。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各种文化没有特殊性；这种意见就是本书将要研讨的不合理意见之一。此刻，欧洲处于繁荣兴旺时期，保持着暂时的平静，很少给人们带来什么问题。然而，我们该如何看待中东民族文化的冲突呢？中东的冲突可能迫使石油高消费的国家卷入其间。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崛起呢？凡是在远东之外的地区长大的西方人，如果他声称自己确确实实地理解中国人或日本人，能够与他们交流思想感情，那么他就是在自欺欺人*。刚刚露头的，还有许多

* 我不是说，没有才华卓著者在这个研究领域开了好头。我说的东西，深深地嵌入了这两种非常精细发达、繁复得难以置信的文化之中——原注。

非洲民族文化和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纷纷要求自己的权利得到承认。在上述一切危机中，人类的未来有赖于自己超越各自民族文化局限的能力，然而，要实现超越，人就得首先承认并接受无意识文化的许多隐蔽的维度，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无意识文化的隐蔽而独特的形式。

使世界政治和文化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如加里特·哈尔丁在《公用地之悲剧》*中显示出的智慧和洞察力一样，人类再也不能继续增加对有限资源的消耗了。可以举经典的英国人使用村社公用地的模式来说明这个道理。在村社中，只要有足够的公用土地，就不会引起公共福利和个人福利的冲突。然而，随着牲畜的增加，放牧过度的土地的生产力随之减少；牧人便增加牲畜的头数，以维持原有的水平而不致亏损。于是，公用地就受到破坏。其悲剧在于，最大限度利用公用地的投机取巧的牧人得到了利益，而承担损失的却是所有使用者。自我克制的人更受到加倍的损害。他们不仅由于邻居的过度放牧而蒙受损失，而且他们无法以自己的产品去开发市场。

今天，海洋、大气、水路、地球、土地及土地的出产，全部都成了我们的共有资源，可是所有

* 该文论述的主题后来写成了一本书，题为《探索新的生存伦理——论“猎犬号”太空船的航天探索》——原注。

这些资源都受到了过度的开发。显而易见，诉诸利他主义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就一定程度而言，利他主义是有勇无谋的办法。技术手段也不能解决这个两难处境，因为这些问题是人的问题。哈爾丁认为，单一渠道的、牛顿式的方法，只会使政客感到心满意足，只会使大规模掠夺资源者感到心满意足，因为把问题简单化的作法只会使他们得到好处。他觉得，我们所需要的办法，是一种更加全面的、达尔文式的（狄俄尼索斯酒神式的）切入办法，这个办法可以用作确立轻重缓急、选择手段的基础。简言之，除非人们能学会同心协力，学会调节消费和生产的模式，否则他们就必然走向灾难的深渊。除非我们了解彼此的思维方式，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通力合作，也不可能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标。

解决问题的答案，不是到限制人的活动中去寻求，而是要寻求新的选择、新的可能、新的范围、新的取舍和新的途径，去发挥人的创造潜能。人类繁复多样的文化中，非常明白显豁地表现出许许多多、无与伦比的才能；承认这许许多多、无与伦比的才能，是发挥人的创造潜力的基础。

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脑子里终生思考的问题。它与我们对自己的深层态度有关。我说的态度不是皮面的态度，不是容易观察、容易感知的态度，而是比

表层出现的东西更加深沉、更加微妙的态度。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自已竟这样刻薄？为什么他们不更好利用自己的才干？打一个比方说，我们好比是培育了自己身上幼稚的东西。由于我们幼稚，我们竟彼此抱定着恐惧的心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普天之下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人类尚未着手开发自己的潜力。由于我们似懂非懂地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们抱怨一切人、一切东西，唯独不抱怨真正的罪魁祸首。

在民间文学、宗教、哲学、制度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看到人类给自己抹黑的证据。看起来，这些给自己抹黑的作法不在意识的控制范围之内，而是深深埋藏在我们心间。人类贬低自己所能干出的事情，给弗洛伊德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使他提出了死亡冲动的假说，使他把自己的理论围绕着下述观念来构筑：人类前进时必然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既然要作到在群体里生活，就必定要压抑基础的能量（里比多驱力）；同时他认为，里比多动量升华成为创造性和合作性的驱力，由此而产生现代的各种制度。在他看来，创造性是人压抑人性需求的副产品。和我们大家一样，弗洛伊德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上述思想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在那个时代的环境里，他的许多思想自有

其道理。然而，对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未能证实弗洛伊德这样的观点：人进步和建立制度的过程，是通过性的能量升华的过程实现的。本书建议的是另一种解释：一旦人们开始发展自体的延伸，尤其是语言、工具和制度之类的延伸，他们就陷入了我所谓的“延伸之迁移”的罗网之中（见第2章）；结果，人们作判断时就会出现错误，就会与自己创造的怪物疏离隔阂，就无力驾驭自己创造的怪物。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进步以牺牲自体延伸出的那一部分为代价，以压抑形形色色的人性而告终。从这一点出发，人的目标应该是去重新发现那个业已失去的、被异化了的天然自我。

毋庸置疑，西方人和他的物质延伸和非物质延伸之间，存在着庞大的冲突领域。我们创造的工具犹如蹩脚的鞋子。由于创造了蹩脚的、运转不灵的延伸，人未能开发自己一些最为重要的精神潜力和身体潜力。一些最为杰出的、最富有思想的心理学家认为，对人最具毁灭性的打击莫过于未能满足自己的潜能。人未能满足自己的潜能时，一种啮蚀人心的空虚、渴求、挫折和错位的怒气就占了上风。无论这一怒火是对内转向自身还是对外转向他人，都要产生可怕的破坏作用。我们知道人类有巨大的才能；我们到处都看到这样的证据。然而，人如何在演化的过程中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不可思议的才能，这个问题尚未

完全认识清楚。我们尚未认清这个问题，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自己还不够敬畏，部分原因是我们知之甚少，以至于没有衡量自己的标准。

问题的症结，部分地存在于这样的张力之中：创造性和多样性与颇为特定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多半的文化以及它们生成的制度，都是由于不得不给颇为特定的问题寻求高度专门化的答案而产生的结果。举例说吧，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村民和农工进厂做工时，第一代工人尚未习惯于工厂的汽笛和线性的作息时间表。和一切前工业时代的民族一样，每当他们挣的钱足以清偿债务，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时，他们就离开工厂，回家享福；厂主为此而惊惶不安、不知所措。这一局面本来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倘若没有一个隐蔽的陷阱——儿童——的话。当时，既没有童工法，也没有人替这些工人在家看孩子。所以，可塑性大的儿童和父母一道在厂里做工。由于他们年轻，他们的脑子里刻下了汽笛的印记。这些儿童成年之后，他们以相应的方式去培养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启动了一连串不适合工人身心需求的事件和处理时间的方式。然而，由于对线性作息时间的适应已经内化和自动化，所以这种适应被看做是一种资产而不是债务。这一适应过程经过了125年才得以完成。今天的儿童是在另一种时间系统中长大的。这一系统和时间空间的关

系，不如以前那样显而易见；它和单个的制度的关系，也不如以前那样一目了然。克服单调乏味的压力。克服人与机器之间速度冲突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因为我们把自己关进了人类动物园，所以我们发现难以逃离这个动物园的禁锢。人们无法与自己赖以生活的制度作斗争，结果，他们首先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怒火转向内部，随后又将怒火转向外部。

再接着讲我们的基本的主题。许多人对自身价值的感觉，与他们能控制的情境的数量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说，许多人把握自我的形象有困难，原因是他们清清楚楚地驾驭的东西，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人之堕落达到的极点。人的需求对制度形式的屈从。在肯·凯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书中的大护士集中体现了一切违背人性的东西和破坏性的东西，一切扭曲交流过程的东西，一切违犯文化规范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我们创造的官僚机构中找到。小说用比喻的手法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人虚弱无力的困境和缺乏自我肯定心态的困境；在我们的时代里，这种现象是司空见惯

* 我所谓的控制情境、驾驭局势，并非指权力控制而言。我只是说，控制一切或大半的交际系统，包括言语交际系统和非言语交际系统，以便使个体能让人感知其存在，使之能成为生活方程中的一个因数。——原注。

** 肯·凯西 (Ken Kesey, 1935—)——美国黑色幽默作家。

的。

虚弱无力的处境和缺乏自我肯定的心态导致攻击性，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反复作出这样的断言。心理上的虚弱无力是过去事件的产物，然而情境上和文化上的虚弱无力却是此时此地活生生的东西。近年来，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暴乱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了自己在推动现行体制中是虚弱无力的。除此之外，找不出其它任何办法来解释，马丁·路德·金*被刺，“进入”柬埔寨**，何以会触发如此不可思议的火山爆发似的狂暴浪潮。动乱的基础早已奠定，但是对少数民族而言，他们虚弱无力的处境，突然之间才彰明较著起来。

目前，贫民窟里的情况较为平静，因为黑人的生活节律进入了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他们现在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校园里的局势较为平静。然而，一个重要的、持续不断的挫折根源依然存在，因为妇女、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其他一些人中的许多天赋和才干，不但没有为他人所承认，而且还常常遭到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毁损。

* 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领袖和民权运动领袖，1968年4月4日被刺。

** “进入”柬埔寨——1970年，美国为切断越南南方的补给线，对柬埔寨支援越南进行报复，采取了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